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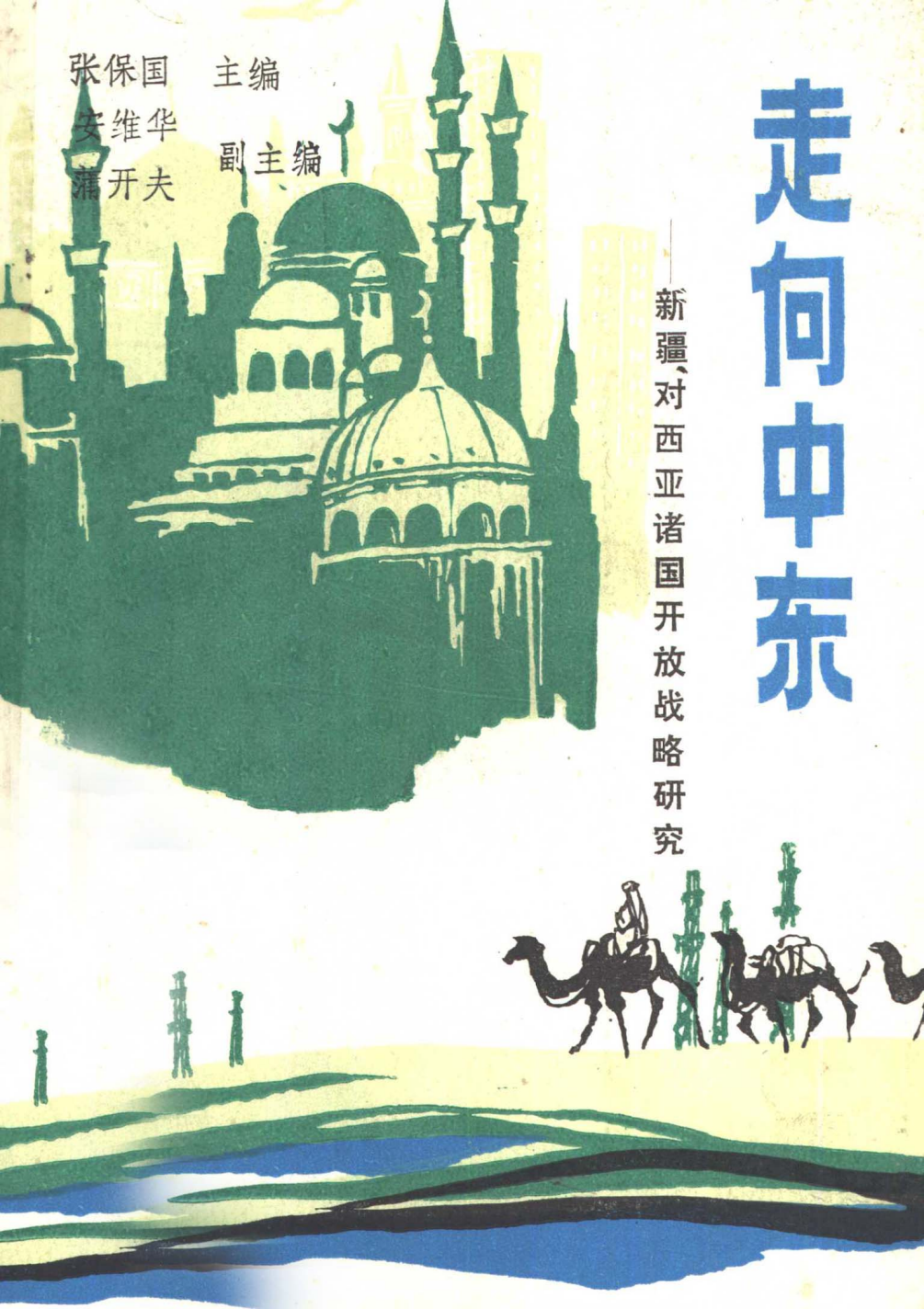
走向中东

新疆对西亚诸国开放战略研究

主编

副主编

张保国
安维华
蒲开夫



走 向 中 东

——新疆对西亚诸国开放战略研究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0年·乌鲁木齐

责任编辑 墨 愚
封面设计 万雪玉
版式设计 王均兵
李明珠

书名 走向中东
——新疆对西亚诸国开放战略研究
作者 张保国 主编
出版 新疆大学出版社
发行
排版 新疆大学计算中心激光照排室
印刷 新疆农业厅印刷厂
版次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规格 850×1168 32开
10.125印张 254千字
印数 1000
书号 ISBN 7-5631-0144-6/F·11
定价 4.00元

序

《走向中东——新疆对西亚诸国开放战略研究》是新疆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课题的一个子课题，也是其中的一个系列成果。它的出版问世，标志着新疆对外开放战略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新疆的对外开放应该逐步向西倾斜——这已越来越被实践证明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是基于对新疆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的正确认识和对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全方位性的科学把握，以及对新疆西部所面临的苏联东欧和西亚诸国这两大片国际市场的深入了解。

近年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新疆各对外经贸实业部门，区内外的诸多专家、学者等都对实际开拓西亚市场投入了许多关注。各种大大小小的代表团、考察团及业务小组等到西亚也去了不少；中央有关部门还几次派工作组来新疆进行可行性调查。这一切，对新疆的向西开放，特别是新疆向西亚市场的推进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不能不指出，直到目前为止，新疆对西亚的经贸业务实际仍然还处于探索阶段；具体与之开展业务的国家还不多，金额也很小，进出口商品的品种比较单调，档次也较低；在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和开展无形贸易方面更是起步维艰。因此，有许多同志一直认为开发西亚市场难度很大，提出，在新疆的向西开放中应该把西亚市场放在第二位，即待下一步

“条件成熟后再开发”。

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本书的作者们是持积极态度的。尽管从战略角度讲，新疆在向西——对苏东和西亚两大片国际市场的开拓中，可以分期达到目标；在步骤上也不妨可以先易后难；但是，对国际市场的占领，我们认为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安排”的，而必须根据客观情况及其变化，随时把握时机，准备进取。市场实际上也等同于战场，在现代国际经济竞争中，时机往往是最重要的，一旦时机到来，不去及时占领，别人就要去占领。

70年代中期，西方的一些企业家就是把握了时机，及时地占领了中东市场的。“走向中东”——这一口号在当时一段时期内曾是日、美、英等发达国家中许多经济大报的通栏。当时，西亚诸国市场，由于大量石油美元的流入，爆发性崛起，刹那间提醒并吸引了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工商界巨头。几乎是一夜之间，“走向中东”、“到中东去”、“向西亚市场进军”等口号成了当时各工业发达国家的大型工商企业、跨国公司及财团们的统一行动。直到80年代初——几乎有近十年的美好光景，他们把各种“买卖”，各式“互相合作”都搬到了西亚国家来做，整个西亚市场被人为地催熟，各种类型和方式的进出口贸易、五花八门的“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都在这片古老的漠土上蓬蓬勃勃地展开。其结果，且不说西亚国家如何受益——这些热热闹闹的经贸活动在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这一时期事实上成了整个西亚历史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仅就各工业国家在这一时期从这一地区回收的巨额石油美元（差不多平均每年有600—800亿，有时甚至是上千亿）来看，就相当可观。争相参加这场角逐的远不止是日、美及欧洲的一些老牌发达国家，还包括亚洲“四小”在内的一些后起发达国家及

苏联等国。正当这些国家争先恐后地踏进中东——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市场时，我国却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进入中东。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仅赶上了中东经济高涨的一个尾期。

80年代后，由于世界油价的暴跌和两伊战争的影响，西亚各产油国的石油收入锐减，整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受到挫折，市场和基本建设大大萎缩，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失去了原有的发展势头。但在这一时期，我国（包括新疆）由于开放政策的贯彻实行，一直在亡羊补牢——千方百计地打入这一市场。其结果虽然有一定成效，但毕竟是不大。因为这是在机遇不好、市场十分不景气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总感到困难颇多，并终究有些事倍功半。

现在，中东的主要战事——两伊战争已经停止，世界的油价也已缓慢回升，并已出现了平稳的趋势。种种迹象表明，中东——这一举世瞩目地区的经济在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萧条之后，正在逐步地摆脱困境、走出谷底，并再次呈现出日渐兴旺和活跃的景象。不少专家认为，中东一些国家的经济在经过一小段时期的恢复之后，大约从90年代中期起将会有新的、较大规模的发展；也有些专家认为等不到中期，西亚某些国家在90年代初期就有可能开始出现新的飞跃。

在这新情势下，我国及我们新疆，显然再不能把西亚市场机械地排在第二位了，而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把握时机，随时准备进取。

本书能在中东市场出现转机 and 日渐景气之前，或之后问世，正是作者一点心意，我们愿将它献给兢兢业业地战斗在自治区经贸

战线上的市场开拓者们,做为我们对他们“走向中东”大业的一点
奉献。

编 者

1990年4月

目 录

第一篇 我国暨新疆同西亚诸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沿革

第一章 丝绸之路及我国古代同西亚的关系	1
第二章 中国同西亚海上交往的发生与发展	13
第三章 现代我国同西亚诸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29

第二篇 现代西亚经济

第一章 总论	49
第二章 新疆与西亚交往的重要通道——巴基斯坦	71
第三章 阿富汗经济	79
第四章 掘进中的土耳其共和国	84
第五章 战争状态下的两伊	95
第一节 伊朗经济	95
第二节 “石油繁荣”与两伊战争后的伊拉克经济	110
第六章 海湾六国	125
第一节 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	125
第二节 对外投资的石油王国科威特	138
第三节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52
第四节 跨越世纪的国家——阿曼苏丹国	163
第五节 海湾明珠——巴林	167
第六节 世界上人均收入较多的国家——卡塔尔	174
第七章 几个地中海国家	182
第一节 地中海之要冲——塞浦路斯	182
第二节 发展中的叙利亚	187

第三节 内战前后的黎巴嫩经济	201
第四节 约旦王国	208
第五节 以色列经济	221

第三篇 新疆向西亚诸国开放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

第一章 新疆的经济发展与向西亚国家的开放	236
第二章 新疆向西亚开放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242
第三章 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搞好 新疆的对外开放	252

第四篇 新疆对西亚诸国的经贸战略与政策研究

第一章 走向中东——方针与目标	260
第二章 西亚市场的特点与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271
第三章 新疆对西亚的贸易发展战略	286
第四章 加强新疆西亚诸国的经济技术合作	296
第五章 大力发展新疆与西亚诸的无形贸易	308
后 记	316

第一篇 我国暨新疆同西亚诸国 友好往来的历史沿革

第一章 丝绸之路及我国古代 同西亚的关系

今日的世界贸易,形成了复杂的理论范畴、交换格局和地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循环系统。所有这些,都是在上古以来逐步形成的古代贸易格局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古代世界贸易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易货贸易(有时纯粹是贡物)在相当长的时代里占据了主导地位,黄金和货币的参加不过是以后的事情。二是贸易活动通常都要经历极艰难险恶的长途运输过程,后来逐步出现了中途转运转手贸易环节。一批货物自启运到抵达,必经诸如盗匪剪径、灾害袭击等种种现代人难以设想的险阻。三是所有的贸易几乎都伴随着人类地理认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新交通线的拓通而进行。这些交通线构成了古代的道路系统,成为联接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纽带,衔接交织成古代的贸易网络。这些纽带沟通了大陆同次大陆、滨海和腹地、东方和西方以及洲际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促进了他们之间货物和思想文化的交流。其中一些重要的纽带被经济史和文化史学家按其传播的人类文明的主要内容分别冠以形象化的名称:横贯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肉桂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运锡之路”、“琥珀

之路”，以及东非的“运盐之路”和北非的“罗马大道”等等。先是以分布在陆地上的纽带为主，以后又联接起随海洋季风而形成的海上纽带，构成了遍布欧亚非三大古陆的古代贸易循环系统。同这些主要纽带相连的还有一些更小的交通—贸易网络。它们构成了古代贸易的微循环系统。在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些至今还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它们全程或部分路段的遗迹上，诞生了现代的公路、铁路和海上交通系统；座落在各国古代贸易中心位置上的一批现代城市，其经济贸易活力经久不衰。而另外一些，或因自然生态环境改变，永远从地图上消失了；或因近代以来政治地理因素的制约而中断了许多世纪。后者便包括著名的陆地“丝绸之路”。

在世界古老的贸易格局中，唯有“丝绸之路”被一致公认为是最有历史意义、用途最多的纽带。在长达十多个世纪之中，它为创造世界文明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横贯中西的这条路上进行的丝绸贸易，不只产生了洲际经济交流史，同时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政治史、文化史和宗教史内容。它代表了我国自上古至近代同葱岭以西的欧亚内陆地区的主要联系。

按照最严谨的历史学家的观点，“丝绸之路”自兴盛至衰落，历时 1500—1600 年，即从公元前 2 世纪中叶我国西汉时起，至 15 世纪中叶我国明朝年间止。其实，无论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国同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都没有停止过，丝绸西传的实际贸易活动比这要早得多。在苏联阿尔泰地区属于公元前 5 世纪的部落酋长巨型顶墓中，曾有过中国丝织品的考古发现；在欧洲希腊、德国和卢森堡等地的公元前 6—5 世纪墓葬中，也曾出土过丝织物和丝线。有理由推断，我国丝绸的西传可能就是始于这个时期，具体说，即始于春秋时代前期。内地丝绸经活动于黄河河套和河西走廊一带的西北游牧民族（如匈奴或月支等游牧部落）转手，传播到欧亚大陆腹地，再经过斯基泰人传入欧洲。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一幅先秦时代我国同西方的贸易途径，而且不妨把它视为最古老的“丝绸之路”。它起于我国河套地区，取道阿尔泰山东麓、北麓，横贯哈萨克斯坦和南俄草原抵黑海北岸，再通过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地区折入阿尔卑斯山以北。这条路线在当时还不是正式的贸易通道。只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才逐步南北移动，演变为东西交通线中段的干线之一，被人们称为“草原丝绸之路”。

为人所公认的真正的陆地丝绸之路的开通，始于我国西汉时的汉武帝和张骞。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凿空”西域，首次打通了我国内地同中亚的交通。由于汉朝军事力量的保障和行政力量的统辖，得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缘开辟正规驿道，并向西延伸至葱岭以外，同中亚、西亚、南亚原有的道路衔接，形成了东起我国长安、西达欧洲罗马的古代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中段穿越今新疆境内的部分，分成了北、中、南三路。充分说明古代新疆在丝路贸易中的要冲地位。

陆上丝绸之路在西方某些著作中有时又被称为马可·波罗之路、马埃斯·蒂亚诺斯之路、中世纪的方济各会士或启蒙时代的耶稣会士之路。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寻索着比他们早千年以上的张骞的足迹东行的。因而，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而缔造的我国古代同西亚诸地的友好关系，理应从张骞开始叙述起。

公元前139年至公元前126年，张骞作为第一位中国使者，率领百余人的使团由陇西浩浩荡荡出使西域，迈出了走向西方的第一步。沿途历经磨难，最终到达了大夏的蓝氏城。至回国止，历时13年之久。他对所到之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风土人情做了调查，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做了详细汇报。尽管在先秦时代的古籍中已反映出有关中亚和西亚的地理认识，然而较详细而明确的历史记载，当推张骞回国后

的报告。其中有关安息(伊朗)的部分,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记载。公元前119年,张骞率三百多人的使团,携良马和金、银、丝绸等贵重礼品,第二次出使西域。抵达乌孙后,他又分别派副使先后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和于阗等地。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我国通往西亚诸国直至欧洲的交通大道,带回了有关中亚、西亚的大量信息,丝路贸易有了正式的开端。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又多次派使者去安息、奄蔡、黎轩、条枝(阿拉伯)、身毒等国。每批使者,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一年所派遣的使团达十余批。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款待,“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安息王还给中国赠送礼品。并派来了魔术师。此后,西域古道上往来人员不断增多,贸易往来逐渐频繁,使者访问接踵不断,商旅驼帮络绎不绝。带有商业性质的使者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物品经河西走廊,越帕米尔高原,历中亚、安息、条枝转运到欧洲。西汉末年,由于王莽之乱迫使丝绸之路一度中断。东汉建立后,安息国王佛罗格斯二世派使节到中国,恢复了友好联系。公元97年,班超奉汉和帝旨出使西域,重新打通西域古道,贸易往来才得以恢复。《后汉书·西域传》载:“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枝、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班超又令其副使甘英从陆路经中亚到西亚各国访问。甘英到达条枝后,本打算经海路赴大秦(罗马帝国),中途受到波斯人的劝阻而未能如愿。但他们获得的有关西亚和阿拉伯半岛的许多材料都很有价值。此时的丝绸之路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②这说明汉朝对发展对外贸易,加强中国同其它国家友好往来十分重视。当时,经“丝绸之路”来中国的大批西方使节和商胡,一是仰慕中国的富足,二是想得到朝廷的钦赐。

他们带来了各国的玉制品、药品、琉璃制品、香料香精、珍贵金属以及畜产品和土特产品。自汉代始，历代中央王朝均规定，凡各国来使朝贡，沿途驿站要负责接待护送。朝廷给“贡使”以很高的奖赏和优厚的报酬，同时允许他们把中国的丝绸、金银、茶叶、瓷器、钱币等带回国去。这样，使节朝贡就成为具有政治色彩的商业贸易手段。东西方贸易往来的繁荣，是我国同西方友好往来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自汉代起至隋唐，出现了中原与西域以及西域以远地方的和亲。和亲并不单纯是一般的联姻关系，而是出于一定的政治和外交的需要，旨在发展中原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开展中西贸易，保证丝路畅通和中原地区的安宁。据伊朗《编年史》记载，萨珊王朝库斯劳一世就曾娶中国公主为其王后^③。菲尔多西在《王书》中曾记载国王库斯劳·阿诺细尔旺与中国宇文周互派使节，并请中国帮助抗击突厥的史实。

魏晋以后，西北陆路贸易更加繁荣。波斯王朝多次派使节访问中国，代表团成员多达百余人。与此同时，中国也多次派使节访问波斯。据波斯史料记载，萨珊王朝取代安息王朝后，在丝路上出现了高级别的访问活动。菲罗兹一世（459—483年）和格包德一世（501—531年）都来过中国。^④这一时期，中国通往阿拉伯的海路也已打通，同时还开辟了新的陆路通道，如罗马人和阿拉伯人发现了经印度洋抵印度西部的道路和从地中海横穿伊朗直达印度北部的道路。这些道路都通过著名的“巴克特拉—咀叉始罗之路”，同新疆境内的南路支线相接。由于海陆交通的共同发展，使中国人对波斯及阿拉伯半岛的认识更全面。《魏书》中对小亚细亚各国情况的叙述显然比汉代史书上的记载详尽得多。同时西方的书籍中也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描述。

隋炀帝时期，中国同波斯来往甚密，曾派李昱出使波斯，波斯王库斯老二世也随即派使臣来中国回访^⑤。隋还在西北边境设交

市监负责来往贸易。从这以后，中东借助于这些商路获得了最大的经济效益。由于波斯垄断了丝绸贸易，并对西方高价勒索，在欧洲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丝绸冷战”。当时丝绸甚至成为左右拜占庭帝国政策的因素：海关条例、和平条约、商行章程、限制奢侈法等，均与丝绸有关。国家对丝绸贸易采取了统一控制政策。罗马国库对丝绸也严加控制，从进口丝绸直至出售成衣，追踪管理。公元408年，拜占庭与波斯签定了丝绸贸易协定，先后建立了若干丝绸交换中心（关税城），严禁在其它地方开展丝绸贸易。

当时的丝绸贸易程序是：由在新疆和中亚长途跋涉的康居、粟特与波斯商人把中原地区的生丝和丝绸贩运到波斯，然后卖给叙利亚人。先纳关税（从价税），一般为物价的12.5%，然后装运至拜占庭、亚历山大，卸船时再纳关税。丝绸在帝国内部又要征收多如牛毛的各种税，价格因此翻番上涨，充实了拜占庭、罗马和波斯的国库。4世纪时，叙利亚出现了丝绸织造的私人作坊；5世纪时，君士坦丁堡有了宫廷作坊。这些作坊都使用中国的生丝原料，时常出现哄抬物价和黑市交易。

唐宋时期，我国与西亚等地的往来较前代更为发展。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8世纪到13世纪是“中国和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唐代我国与阿拉伯的交通主要分为陆道和海道。陆道即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海道则由广州通波斯湾。当时经两道来华经商、游历的阿拉伯人为数众多。这在《旧唐书》和《册府元龟》中都有详细记载。大食（阿拉伯）第一次派使节来中国是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此后，大食曾多次派人来唐，甚至一年中有好几次。据陈垣先生统计，在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间（651—798年），有记载的正式遣使就有37次。如果把遗漏的加上，远不止于此。与此同时，大批犹太商人也于7世纪时涌入我国内地。唐代也是我国同波斯交往最频繁的时期。据记载，自公元

647年到762年这115年间,波斯派到我国的使节达20人次之多,大食和波斯来华经商者达10万余人。他们向唐王朝进献良马、大象及珍禽等。有些在史书中只注明“献方物”而未写明具体礼品名称。当时阿拉伯同中国贸易影响之大,可从当时一位阿拉伯人阿布赛德·哈撒的记载中看出:“中国之事变波及于海外万里之西拉甫港及瓮套省两地之人。前此恃营商中国为生,至此破产者所见皆是也”。^⑥这些“朝贡”的使者和商人当中有的在长安、洛阳等地经商几十年,有的和中国人通婚,在我国定居,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史、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

唐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大大拓展了我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同时,它还极大地促进了中西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其中粟特人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公元7世纪前半期,在罗布泊以南和兰州、洛阳等地,建立了大型的粟特商人聚落。他们把新疆南部的坎儿井灌溉法沿丝路传播到远方,把中亚酿葡萄酒的技术传入内地。他们使中原的木版刻印技术通过中亚向西传播,并把西方改进后的羊毛纺织技术传入中原。他们向其它民族传授了中原地区的金属甲冑锻造技术,又向中原传播了制造高档琉璃的技术。正是在借鉴后者的基础上,7世纪起,中原制造出风靡世界的细瓷器,一度成为世界大宗贸易的主要内容。造纸技术也在这一时期传播到西亚和阿拉伯。^⑦

7—8世纪,我国处于对外开放的颠峰。在中亚、印度支那和高丽,分布着唐代的臣民和蕃属。在丝绸之路上,商贾络绎不绝;取经、朝圣进香者足迹穿越印度,直抵锡兰。唐代的商船队在海中游弋,大宗货物飘洋过海,畅销远方,占据了波斯和拜占庭市场,销售于欧亚内陆的游牧民族中。丝绸在国际贸易中被作为交换价值使用。直至中世纪末的西方文献中,仍旧记有丝绸作为“购销价值”、“运费”或“船费”的事实。9世纪后半叶开始,我国丝绸外贸主要经

由中亚—可萨突厥地区—黑海、中亚—伊朗呼罗珊地区两线进行。从阿拉伯和西亚诸地进口的产品有乳香等复合香料，亚麻和羊毛，小亚细亚和巴比伦的地毯、医药、矿产品、珠宝等。

唐末，由于安史之乱，西北陆路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在南方，因黄巢大起义，西方同广州之间的海路贸易也于公元 878 年中断。

宋辽时代，我国恢复了同阿拉伯的往来。据史书记载，大食等国遣使至少有 43 次。宋与阿拉伯的交通主要是走海路。因为在中国西北部，当时辽控制了河西走廊通道。但“丝绸之路”并未完全废弃。宋辽同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仍未间断，甚至在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大食遣使仍经陆路抵熙州。丝路贸易此时成为区域性的贸易，而且形式多以进贡为名，其交换中原商品的意图很明显。这种进贡的商业性质表现为次数多，人数多，进贡物品数量大且种类多。一些使团看上去是外交使团，实则是一支庞大的贸易使团，借进贡之名进行商业贸易。其中不乏冒充“使者”的商旅。王日蔚在《契丹与回鹘关系考》一文中说：“古代异国之朝贡，其经济意义胜于政治意义，且大都朝贡者所得利益反胜于受朝贡者，故受朝贡者一方往往限制朝贡者一方之次数。朝贡者所得赐物若不足偿其值时，则往往当廷争执，索还贡物”。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贸易桥梁，其重要地位并未被人们所忽视，它仍是中西交通的干线。

元代在历史上是中西交通的全盛时期。成吉思汗南征北战，一统天下，建立了一度包括西伯利亚、基辅罗斯、波斯、印度、中亚广大地区和中国本土的大帝国，从而结束了一千多年来由于各地政治情况变化而引起的中西交通时断时续的状况，使海路、陆路往来完全畅通无阻，达到了全盛时代。蒙古的扩张给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对东西交通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朝廷在各地都设立了驿站，保护东西往来的畅通。14 世纪一位欧洲商人写道：“据来往商旅所说，从顿河口的塔那去中国的旅途，不论日夜，都非